

同盟会与萍浏醴起义

饶怀民·著



● 岳麓书社

107

95
K257.107
1

同盟会与萍浏醴起义

饶怀民/著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李润英

封面设计 许康铭

同盟会与萍浏醴起义

饶怀民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0,000 印张:8.25 印数:1—1,000

ISBN7-80520-510-8

K·93 定价:6.80 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黄兴(1874—1916)



宋教仁(1882—19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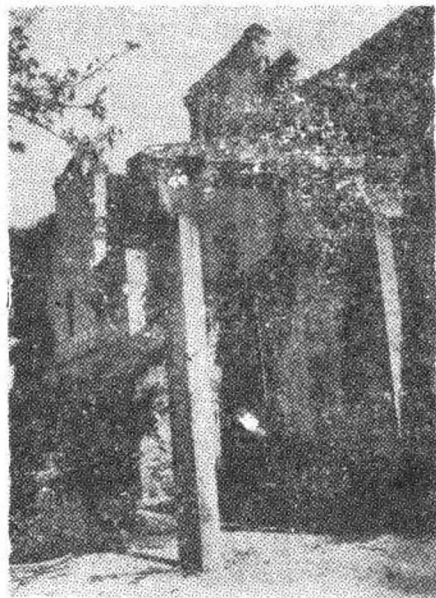
刘揆一(1878—19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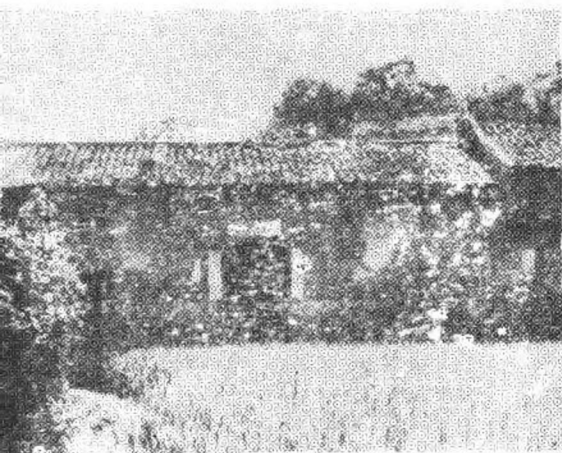
禹之谟(1866—19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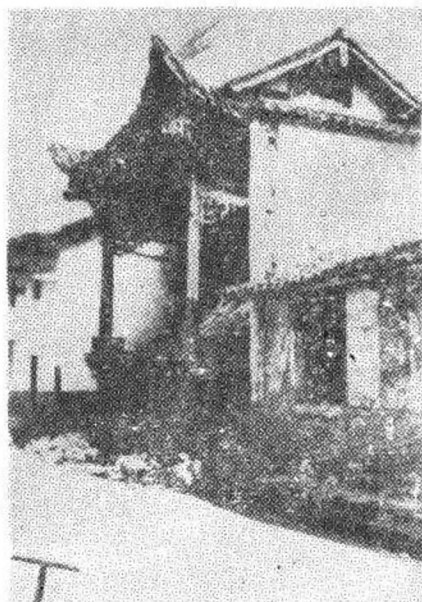
刘道一 (1884—1906)



萍乡慧历寺会议遗址
(慧历寺门)



萍乡高家台会议遗址
(高家大屋)



龚春台义军誓师地遗址
(浏阳大圣庙戏台)

目 录

第一章 萍浏醴起义原因综合考察·····	(1)
一 奇峰突兀的地理环境·····	(2)
二 列强对湘赣的经济渗透·····	(3)
三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6)
四 反清革命传统源远流长·····	(8)
五 自然灾害横行·····	(12)
六 会党势力大规模集结·····	(15)
第二章 萍浏醴起义的酝酿和准备·····	(25)
一 中国同盟会成立·····	(25)
二 公葬陈姚二烈士及禹之谟狱·····	(29)
三 刘道一回国返湘·····	(32)
四 长沙水陆洲会议·····	(40)
五 萍乡蕉园会议·····	(43)
六 萍乡慧历寺会议·····	(52)
七 萍乡高家台会议·····	(56)
第三章 萍浏醴起义爆发与胜利进军·····	(58)
一 义军队伍的组成·····	(58)
二 挺进上栗市·····	(63)
三 醴陵战场的硝烟·····	(64)
四 转战浏阳城·····	(65)
五 浏南战场的烽火·····	(68)

六	浏东战场的鏖战	(70)
第四章	萍浏醴起义失败及其历史教训	(81)
一	义师饷械不济	(82)
二	洪福会与洪江会宗旨迥异	(85)
三	会党“器悍难制”	(87)
四	义军与清军力量对比悬殊	(91)
五	安源矿工未能执械起事	(96)
第五章	萍浏醴起义中革命志士的献身精神.....	(112)
一	残酷的“清乡”运动.....	(112)
二	刘道一视死如归.....	(116)
三	禹之谟慷慨捐躯.....	(121)
四	湖北日知会案.....	(126)
五	南京党狱.....	(133)
第六章	萍浏醴起义的社会反响.....	(136)
一	对封建统治者的打击.....	(136)
二	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打击.....	(143)
三	对保皇党人的打击.....	(144)
四	对革命人民的巨大鼓舞.....	(146)
第七章	萍浏醴起义的性质.....	(153)
一	起义的领导者.....	(155)
二	起义的动力.....	(172)
三	起义的基本纲领.....	(177)
四	同盟会与萍浏醴起义.....	(181)
附录:	也谈萍浏醴起义史料的真伪问题	
	——与《萍浏醴会党起义檄文辨伪》一文商榷	
		(194)
	萍浏醴起义大事记.....	(242)
	后记.....	(257)

第一章 萍浏醴起义原因综合考察

1906年12月4日，在湘、赣边境的萍乡、浏阳、醴陵地区，爆发了由同盟会策动和领导的以会党徒众为主力的一次声势浩大的起义。这次大起义，旨在推翻帝制、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这是1905年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南部中国自太平天国以后范围最大的一次革命。参加起义的群众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地区的一部分煤矿、陶瓷工人、湖南醴陵、浏阳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聚众30,000多人，义旗所指，云集响应，起义遍及萍乡、浏阳、醴陵、衡山、湘潭、平江、宜春、万载、义宁（今江西修水）等市、县，与清兵鏖战匝月，交战20多次，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清政府集结了湘、鄂、赣、苏四省兵力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然而，萍浏醴起义犹如狂飙突起，震惊中外，敲响了爱新觉罗王朝覆灭的丧钟！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规模如此宏大的萍浏醴起义为什么会在1906年爆发呢？又为什么会在湘、赣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一带爆发呢？过去，人们往往只是局限于从某个方面探讨其原因，而对萍浏醴起义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缺乏多视角、全方位的综合考察，因而不能科学地阐释其发生的原因。其实，任何一种历史现象的产生都有多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是一种历史的合力所产生的结果。恩格斯曾经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说过：“任何地方发生革命的震动，总有一种

社会要求为其背景。”^①只要考察一下萍浏醴起义前的社会“背景”，人们就不难发现，萍浏醴起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它的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就客观条件而论，20世纪初，列强对湘、赣经济的渗透加剧了民族矛盾；而封建剥削的苛重、自然灾害横行又使这一地区阶级矛盾激化；就主观条件而论，这一地区的采煤业、传统手工业诸如制瓷业、花炮、夏布等行业的发展使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这就为萍浏醴起义创造了物质前提。萍浏醴地区向来是会党势力比较雄厚的地方，反清革命传统源远流长，湖南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黄兴、刘揆一、刘道一、陈天华等人一直注重对这一地区会党的联络和发动，使之纳入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加以萍浏醴地区处于湘、赣两省的交界处，清朝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统治者鞭长莫及，而奇峰突兀的自然地理环境又为会党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使他们有了用武之地。

一 奇峰突兀的地理环境

萍乡、浏阳、醴陵地区山岭纵横，林深菁密，风光奇丽多姿，路径犬牙交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湖南东部与江西西部接壤的万洋山、武功山把湘、赣两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构成湘、赣间的山区走廊，其中，特别是武功山的最高峰高天崖是湘、赣地区屈指可数的高峰，“地势险峻，环延百里，统名为大安里。”大安里“由萍乡之山口岩而入，外险内平，跨延两省数县。”内有天然山洞，可容数千人，山口岩“仅存仄径，有一夫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1页。

当关，万夫莫开之势。”^①萍乡西北界连浏阳，西南毗连醴陵，为两省通衢，离萍乡县城不足8公里的安源，煤矿蕴藏量极为丰富，此处“人烟稠密，五方杂处”，“开矿造路，商贩云集。”^②浏阳县因有浏阳河而得名，浏阳河弯过几道弯，蜿蜒流入湘江，“浏阳通省要隘既多，且南接湘潭，据长沙之上游；北界平江，为长沙东北之屏障；而醴陵又南接茶陵、攸县，为长沙东南之奥区，处处皆可窜越”，^③在在均宜举事。素有“小租界”之称的麻石，为萍浏醴三县所共管，实际上没有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这里的革命势力尤为雄厚，“麻石、麻石、坚硬如石。”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反映了麻石战略地位的重要，磨石确已成为广大会友最理想的聚集地和从事革命斗争的根据地。

二 列强对湘赣的经济渗透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曾经明确提出，“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的时期是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同时，他还指出，19世纪末，特别是1900—1903年的危机，“这

① 《江西巡抚德馨奏进剿大安里擒获邓海山折》（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载《萍乡哥老会起义资料汇编》、《萍乡文史资料》（总）第10期第75页。

② 《护理江西巡抚柯逢时奏缉获哥弟会党头目傅美球等片》（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七日），（军机处录副奏折），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2页。

③ 《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奏萍浏醴会党起事始末及剿办详细情形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三日），《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以下凡引自该书者，一律简写为《汇编》，特此说明。

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①列宁在《致印涅萨·阿尔曼德》的信中更清楚地谈到了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时间，他写道：“您忘记了主要的一点：1891年根本不存在帝国主义（我在我的册子里竭力证明，它是在1898—1900年产生的，不是在这之前），也不存在帝国主义战争。”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局，给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带来了过去不曾有过的新特点，他们在继续进行商品输出的同时，开始大规模地进行资本输出，与此相联系，要求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斗争也愈趋激烈。帝国主义以武力为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对中国的经济渗透也大大地加剧了。他们的触角开始由中国的边境和东南沿海地区渐次伸向长江中上游和内地省区，他们采取政治借款、开办工厂、矿山和兴建铁路投资等形式进行资本输出，伴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步步深入，湘、赣等省的经济生活也正在经历着激剧的变化，1898年，由大买办盛宣怀出面，向日、德等国借款，开办萍乡安源煤矿。开办的头一年，年产煤10,000吨，制焦29,000吨。③而且，汉阳铁厂所需的煤，大都仰仗于安源煤矿，中间有很长一段陆路给运输带来诸多不便，于是，经张之洞、盛宣怀等向清政府奏准修筑萍潭铁路，铁路于1900年正式开工，1903年12月，萍醴段即自安源煤矿到醴陵城的45公里铁路竣工。1906年1月，由醴陵到株洲的一段铁路又修成，萍乡的煤就可以经过株洲再转水路直接运抵汉阳。日、德等国曾派出大量洋人监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4页。

② 列宁：《致印涅萨·阿尔曼德》，《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55页。

③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88页。

督和技术顾问进入矿区，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安源煤矿的开采权，并以此为突破口，加紧对赣省矿业资源的掠夺。

与此同时，列强也加紧了对湖南的经济渗透。1899年11月13日，岳州向英国开关，称为“自开商埠”，其享受的侵略权益除不设租界外，与“约开商埠”几乎雷同，从而打通了帝国主义势力侵入湖南的通道。但是，英国并不以此为满足，又进而提出将长沙开为商埠，日本援例要挟，1904年7月1日，长沙正式开埠，长沙原拟作为“自开商埠”，但英、日两国擅改原议，定长沙“与已开各通商口岸无异”，使长沙成为继“自开商埠”岳州之后的“约开商埠”。长沙“东臂为浏阳，东南藩蔽为醴陵，醴陵之东为江西之萍乡。”长沙的开埠，大大方便了列强对长沙周围的浏阳、醴陵、常德、湘潭、衡阳等地的经济渗透。此后，英、日两国欲壑难填，遂于1905年4月再度向清廷提出，要求将常德、湘潭开作“自辟商场”，由于学生群众和爱国士绅群起抗争，清廷虽未敢将常德、湘潭两市贸然开埠，但仍作为英、日两国的“寄港地”，即作为上、下行客和起卸货物的场所，实与“自开商埠”无异。英、日侵略者首开其例，洞开湘省门户之后，各帝国主义分子哗然而入，法、美、德等帝国主义者凭借所谓片面最惠国待遇，也把触角伸向了湖南的城镇和乡村，“岳州已属通商，长沙亦约开口岸，极长湖内外数百里之延袤，随处可游弋自如；常德、湘潭水道本极环通，又畅行内港商轮之利，形势便利，指顾可航；各地方官吏平日既未研究约章，娴习交涉，略不经心，遂相率沿为常事。”因而，各国轮船航行的范围远远不只是局限于岳、长、常、潭四口，“并有溯湘潭以上赴涿口、株洲一带”者。^①这样，列强在洞庭湖各

^① 《湖南洋务局请护抚宪通飭各局劝阻兵轮文》，《湖南官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水系几乎“随处可游弋自如”，为了航行的方便，日本曾派专人在湘江各处进行测量，并绘有战略地图，还赶造一种适宜于内港航行、快速灵活的浅水轮；为适合大轮行驶，长沙关税务司英国人夏立士呈请抚、部、院，要求“将河开深，以便冬季无所阻滞”，总之，英、日等帝国主义者通过这些措施，使洞庭湖各水系连接起来，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利用水陆运输的方便，源源不断地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燃料，吮吸着湘、赣人民的膏血；加以苛重的战争赔款，造成湘、赣各省地方财政支绌，仅以湘省为例，“甲午中日之役后，复岁摊赔款数十万两，至是本省财政，乃益形艰窘。”^①及至《辛丑和约》签订，清政府为偿付列强赔款，摊派给湖南的总额为70万两，每月应交银58,333.33两，复加俸饷、旗兵加饷，加增东北边防经费、漕折等4项，年解银304,000两，按月应解银25,333.33两，两项合计银83,666.66两；此外，因1900年衡州教案赔偿衡州英国福音堂、天主堂386,000两，1902年辰州教案赔款英金10,000镑，约合白银80,000多两。所有这些负担统统落在湖南人民身上，而贪官污吏乘机需索中饱，“往往筹十万之款，归公者尚不及半。”湘抚俞廉三采用盐斤加价，加增土药税捐，甚至干脆在田赋项下再增加一项“口捐”，把赔款“平均”摊派到每个农民身上，从而加速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造成了清末地方财政支绌，光绪末年，“年亏百数十万两”，使湖南地方财政进入“剧困时期”，几至濒临崩溃的境地。

三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一方面加速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

^① 陈子钊：《湖南之财政》，湖南湘益印刷公司，1934年版，第12页。

产，造成农村经济的凋敝；另一方面，又促成了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诚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促进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①1895年以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尚处于兴起阶段，官督商办企业和官办企业占资本总额的77.6%，商办企业只占22.4%；但是，在1895年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初步发展阶段，属于早期官僚资本的官督商办、官办企业的资本额，由占77.6%下降到23.7%，属于民族资本的商办企业的资本额由占22.4%上升到76.3%，而资本额增长数量接近20倍。②特别是纺织、面粉等轻工业部门，民族资本居于遥遥领先的优越地位。由于帝国主义者凭借雄厚的资本，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料进行生产，具有明显的垄断性，必然促使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这不仅有利于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同时也多少给湘、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阔的余地，为在竞争中求得生存，民族资产阶级组织并掀起了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收回矿权、抵制洋货运动，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这也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主观上的努力。萍浏醴起义发生前，湘、赣民族资本主义业已呈现出初步发展的势头。湖南以路、矿为主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03年—1911年，湖南共建路、矿、厂、航企业104家，总投资额为1,707.4万元，比前一时期大为增长，且其中绝大部分属于商办性质。从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35页。

② 林增平：《略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末立宪派》，《辛亥革命史丛刊》第2辑，第48—49页。

这些企业的布局上看大多分布在长沙以及长沙周围的岳州、衡州、湘潭、株洲、浏阳、醴陵等地区。而且，在湖南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手工业占有相当的比重，浏阳以盛产夏布、花炮而著称，其夏布织造之精，巧夺天工，以此“战天下之商场，未尝遇敌，车牛远贾，南北奔凑，岁售银百十万两。”^①所产之花炮独具特色，艳压群芳。醴陵盛产陶土，浏山周围数十里皆是，其他各乡所在多有，所产细瓷，质地精美，行销国内外，其西南重镇渌口，“商务繁盛，居民逾万人，每年旧历正、五、八月，逢年过节，迎神赛会，尤为热闹”，^②整个萍浏醴地区一时呈现出商贾云集、百货汇聚的景象。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萍浏醴起义不是独立于经济基础之外的孤立事件，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如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样，萍浏醴起义是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产物。

四 反清革命传统源远流长

早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萍浏醴地区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曾发动过响应太平军起义的斗争，起义被清朝地方当局镇压下去以后，群众的自发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

在浏阳县境，于1867年6月8日发生过一起由会党首领姜守东、张以喜等人领导的起义，烧毁达浒团总黎端甫家，旋聚集于窑下坪、姜卢墩一带，图扑县城，知县王汝星稟请巡抚

① 谭嗣同：《浏阳麻利述》，《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9页。

② 张平子：《我所知道的马福益》，《辛亥革命回忆录》（2），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刘昆，派记名总兵于高胜率领驻省锐字营勇 500 名，驰往镇压，经过激战，余众杀伤观音塘团总谢长隆后，向江西万载方向逃散。

在醴陵县境，于 1891 年夏，会党首领严嗣舜聚众突入衙署，击毙团首兵丁，焚毁县署，后因众寡悬殊，援兵不继而败。

在萍乡县境，斗争此伏彼起，连年不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 1892 年 9 月 18 日发生在萍乡大安里的邓海山领导的哥老会起义。邓海山早年为清兵营弁，因不满清廷而遭辞退，以教练拳棒为生，往来于湘、赣之间，在湘偶遇屈希元、周子林，遂结义参加哥老会，首倡武（功）岳（麓）山洪福堂，被推举为正龙头，从此，他便开始在湖南的醴陵、浏阳、攸县和江西的萍乡、宜春、万载、安福、莲花等地发展会徒，传授口号，并以大安里为根据地开展活动。为扩充革命力量，邓海山与大安里富绅罗凤冈取得联络，决定举行武装反清起义。人数“约有八、九千人之谱”^①。是年 9 月 3 日深夜，会众突袭醴陵县署，闯衙劫狱，救出被无辜判处永远监禁的会友邓云辉、罗翊庭等人，当行至八里坳时，与追击的清兵衙役发生战斗，3 名会友阵亡、10 名被俘，余众乘夜撤回萍乡。9 月 17 日，各路哥老会众齐集大安里，拥戴邓海山为王，准备翌日起义。9 月 18 日凌晨，邓海山在市上坳口祭旗起事，称立“楚氏一王”，并封罗凤冈为平南王兼总办粮台；黄仁伢为三大王，镇守天王寨；罗石仔为石大王。手执梭镖、大刀、肩抬长龙土炮的会徒情绪高昂，各色鱼尾旗迎风招展，口号声响彻山谷，震撼着大

^① 《江西巡抚德馨奏严讯邓海山等起义首领并请保奖出力员弁折》（光绪十八年十月十日），载《萍乡哥老会起义资料汇编》、《萍乡文史资料》（总）第 10 期，第 76 页。

地。原定起事后由邓海山率众从大安里出发，出山口岩，兵分两路：一路经芦溪、宣风，攻打袁州府；一路经上埠、高岗埠，攻打萍乡县城，西取醴陵。不料祭旗之时，飓风陡起，将旗杆吹倒，有些会目认为兆头不好，纷纷离去，剩下的部分会众只得暂时屯驻大安里，邓海山派邓云辉率义军一队到山口岩把守关口，另派罗翊庭、罗安仔等带义军数百人攻占芦溪，夺取芦溪团练军械，东阳吴姓有团练乾、坤两营，闻讯赶来，旋由族绅吴启焘、吴扬烈率团赶赴芦溪，与芦溪团练合攻义军，义军向上埠方向退却，邓云辉率众从山口岩冲出，将团练击退。9月23日，邓海山率义军2,000人，出山口岩，经上埠、阪田、向南坑进军，傍晚抵达南坑，宿营万寿宫；次日，清军吉字营会同地方团练，深夜从萍乡至南坑，偷袭义军，邓海山仓促应战，退至婆官冲，陷入清军重围，战死400余人，邓海山率余众经会双，出麻山，朝湘东方向逃走。9月26日清晨，杞木团练与湘省振字防军赶赴湘东，义军正分散在各家店铺吃早饭，猝未及防，腹背受敌，损失惨重。邓海山杀出重围，只身逃脱，隐匿在柳源地方，至10月3日，终被清军和团练兜拿，10月8日在南昌遇害。余众转入地下，延至1894年，才被最后镇压下去。邓海山起义给江西地方当局乃至清廷以沉重的打击，事后，江西巡抚德馨在给皇上的奏折中写道：“设使扑灭稽迟，该匪稍得藉手，如火燎原，何堪设想？”^①并责成萍乡县令每年按季亲往偏僻村庄巡视一次，可是，日久玩生，继任该县县令者视同具文。萍浏醴起义爆发前，大安里一带小股的起义一直未停，而且蔓延至萍乡壤地相接的醴陵、浏

① 《江西巡抚德馨奏严讯邓海山等起义首领并请保奖出力员弁折》（光绪十八年十月十日），载《萍乡哥老会起义资料汇编》《萍乡文史资料》（总）第10期，第77页。